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HEILONGJIANGSHENG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ZIZHUXIANGM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在艰难中前行的 美国外交（1933—1941）

国洪梅◎著

ZAIJIANNANZHONG QIANXING DE MEIGUO WAJIAO
ZAIJIANNANZHONG QIANXING DE MEIGUO WAJIAO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HEILONGJIANG SHENG SHEHUI
KEXUE XUESHU ZHIZUO CHUBAN



ZIZHU XIANGM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在艰难中前行的 美国外交（1933—1941）

国洪梅◎著

ZAIJIANNZHONG QIANXING DE MEIGUO WAIJIAO
ZAIJIANNZHONG QIANXING DE MEIGUO WAIJIA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艰难中前行的美国外交 : 1933 ~ 1941 / 国洪梅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 - 7 - 207 - 10587 - 5

I. ①在… II. ①国… III. ①外交史—美国—1933 ~ 1941 IV. ①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1833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王凯宏

在艰难中前行的美国外交(1933—1941)

国洪梅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587 - 5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美国对俄国政策的回顾	42
第一节 美国对俄国的友好政策(1781—1898)	42
一、与俄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42
二、百年友好	48
第二节 美国对俄国的敌对政策(1898—1917)	58
一、与俄国在亚太地区的争夺和日俄战争中的反俄政策	58
二、拒绝与俄国结成反日同盟	63
三、从冷淡到观望	67
第三节 美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不承认政策(1917—1932)	70
一、美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	70
二、不承认政策的出台和美国对苏俄(苏联)的孤立和排斥	75
小结	84
第二章 美国承认苏联(1933)	86
第一节 罗斯福政府决定承认苏联的原因	86
一、克服经济危机的需要	87
二、遏制日本和德国在亚欧的扩张	90
三、美国公众和社会舆论的推动	92
四、罗斯福总统个人的作用	95
第二节 美国承认苏联的进程	101
一、承认苏联的谈判	101

二、与苏联签订《罗斯福—李维诺夫协定》	106
三、美国国内外对承认苏联的反应	111
四、建交初期美国与苏联的接触	114
小结	116
第三章 利用和限制政策的基本形成(1934—1935)	118
第一节 美国与苏联进行债务谈判	118
一、债务谈判前美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118
二、与苏联进行债务谈判	121
三、与苏联签订 1935 年贸易协议	140
第二节 美国在共产国际问题上与苏联的矛盾与冲突	146
一、苏联与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	146
二、美国与苏联在共产国际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	150
小结	156
第四章 利用和限制政策的全面实施(1936—1938)	158
第一节 1936—1938 年的国际形势与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158
一、拒绝苏联提出的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	158
二、对苏联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	164
第二节 美国对苏联的贸易政策	169
一、与苏联更新 1935 年贸易协议	169
二、与苏联签订 1937 年商业协议	176
三、与苏联更新 1937 年商业协议	183
四、搁置与苏联的债务谈判	189
小结	194
第五章 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结束与战时合作的开始(1939—1941)	195
第一节 1939—1941 年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变化	195
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195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至苏芬战争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201

三、苏芬战争至苏德战争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204
四、苏德战争后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211
第二节 美国对苏联的贸易政策	218
一、与苏联签订 1939—1940 年商业协议	218
二、与苏联签订 1940—1941 年商业协议	222
三、与苏联签订 1941—1942 年商业协议	227
小结	230
结 论	232
一、双重性是 1933—1941 年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表现	232
二、对立和冲突是 1933—1941 年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	233
三、利用和限制是 1933—1941 年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手段	238
四、对苏联的认知和僵化的外交手段是 1939—1941 年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原因	241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64

前　　言

自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来,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就在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苏政策更是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即使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原苏联版图内的国家,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异常重视,因为这些国家在军事、国防工业等方面的技术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追溯和研究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1933—1941年这一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对把握美国对苏政策的实质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不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且也为战后美国的对苏政策确立了基本的框架。

一、研究思路

本书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结合了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在参照大量的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对比、个案研究等手段,史论互动,对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具体地说,既要考察美国对苏政策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和特点,还要考察这个政策在整个美国对苏政策中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把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因素在美国对苏联政策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做出恰如其分地说明,从而更深入地掌握美国对苏政策的实质以及发展变化。

^① Joseph S. Nye, Jr. e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vii.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是从 1933 年到 1941 年,就是说,从美国承认苏联到苏德战争的爆发。

1933 年 11 月,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美国被迫搁置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承认了苏联。美国之所以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是以防止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促进经济的恢复,以及扩张美国的价值观念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它受制于美国当时的战略目标及战略地位。

美国承认苏联后,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利用和限制政策,这个政策受美国对苏联的认知、僵化的外交手段及国际社会的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在美国对苏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潜在作用,它既是影响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因素,又是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工具和手段。考虑到将来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在建交后没有立即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既没有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积极与苏联进行合作,也没有响应苏联联合英、法、美等世界大国遏制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的倡议,相反,美国却与苏联在各个领域的交往中,始终以掌握着主动权为宗旨,处处限制和削弱苏联,以期对自己有利。

1939 年 8 月,苏联与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引起美国的普遍反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苏联侵犯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等国的领土和主权,用武力威胁甚至战争的方式扩大西部疆界,建立东方战线。美国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行为进行了激烈的谴责并加以严厉的制裁,美苏关系迅速恶化并跌至“沟底”,^①意识形态又一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侵略苏联以后,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改变了对苏联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和英国一起公开对苏联进行声援并提供物质援助,此后,美国和苏联逐渐开始了为击败法西斯国家的战时合作。美苏合作只局限于二战期间的一段特定时期,从战争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确实为最后击败法西斯奠定了基础。但是,从美国对苏政策的长远影响看,由于此期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特别是两国深层次矛盾的逐渐暴露和不可调和,促使以乔治·F·凯南为代表的一些美国驻苏外交官逐渐形成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冷战政策设想,这些设想对杜

^① [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游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12 页。

鲁门主义的形成以及对美苏冷战的开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3—1941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意识形态总是时时发挥着重要影响。总的来看，美国在对苏政策中一直都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为什么1933年美国暂时搁置了意识形态问题？虽然在此后美国官方没有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但是，意识形态自始至终融入美国的政策之中。此时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对苏的政策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简单地说明。

意识形态一词是由法国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796年首先使用的，它不仅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且也涵盖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涉及的范围很广。就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如美国教授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从宏观方面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影响，^①中国学者张宏毅在《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一文中也探讨了美国反共主义在美外交政策中的演变过程。^②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具有双重的功能。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既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归根结底，意识形态始终是为国家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言：“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双重的功能。它们或者是政治行动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通过追求政治权力以图达到的那些目标；或者是装点门面的虚伪之辞，用以隐藏所有政治都固有的权力因素。两种功能可以是各自单独行使的，也可能是同时发挥的。”^③

与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相比，在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比较特殊和复杂。十月革命前，尽管俄国的意识形态和美国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因为它没有对美国社会制度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美国在对俄政策中，始终把意识形态置于次要位置，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俄政策中始终从属于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从总体看，美国的对俄政策不具有对抗性的特点，矛盾冲突占次要方面，友好合作占主流。

十月革命以后，由于苏俄的意识形态是以埋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终极目标，

^①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the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张宏毅：《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③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已经构成致命的威胁,因此,在美国对苏俄的政策中,开始把意识形态置于重要甚至等同于国家利益的地位。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既是美国的对苏政策的目标,又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苏俄的政策具有对抗性的特点,友好合作占次要方面,而敌对冲突则占主流。

具体而言,1933年,虽然美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根本对立,但是当美国受到法西斯国家的威胁,而单凭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保护国家的安全时,为了消除外部的威胁并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美国政府毅然搁置了与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放弃了16年的反苏政策。因为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意识形态毕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国家安全相比,它始终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因此,当美国决策者面临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选择时,“往往牺牲前者维护后者”^①。尽管苏联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构成威胁,但这个威胁不是现实的威胁,而是将来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相比,这个威胁还不具有现实的危险性。意识形态的从属地位不仅体现在美国承认苏联时,而且,也体现在美国承认苏联以后对苏联的政策中。例如,在共产国际问题上对苏联的容忍、苏芬战争后对苏联政策的缓和,以及苏德战争爆发后对苏的援助等等,美国就并不是仅仅考虑意识形态,而是充分考虑到意识形态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利益。

虽然在承认苏联时,美国暂时搁置了与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是,意识形态势必会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内容和战略目标发生影响。1933—1941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及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一点。由于这种影响,美国害怕苏联将来会利用国家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向美国发动进攻,担心苏联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种担心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被无限制地夸大,使美国对苏联滋生很多偏见和误解,以至于把苏联的每一个行动都看成是别有用心的行为。这些误解使美国对苏联的认识严重偏离了事实,从而影响了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这个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看,虽然美国在形式上保持着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绝不等同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平等协商、互利互助的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对构成将来威胁的苏联的防范,美国不可避免地对苏联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例如,美国在债务问题、贸易政策、制

^① 刘建飞著:《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裁苏联等一系列政策上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上述问题上,就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所发挥的作用而言,表面上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但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利益而进行的争斗。也就是说,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既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更是国家安全和经济、政治利益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意识形态成了美国在推行对苏政策中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宗教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并扩大国家影响的重要手段。

从本书的学术价值看,首先,研究这段历史既可以加深对美国在其他时期对苏政策的理解,同时,也使美国对苏政策的研究有了连续性、完整性和全面性。目前,国内对美国对苏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即所谓热战;^①第二个时期是美苏战时合作及其矛盾;第三个时期是二战以后美国对苏联的全面遏制,即冷战。特别是“构成美苏关系的最大组成部分”^②的冷战更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与上述研究领域的深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者对1933—1941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却重视得不够。在他们的研究中,大部分人对此问题或是一笔带过,或是简单介绍,基本上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实际上,这个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非常重要,它在美苏从热战转为冷战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作用。加强对这一时期美国对苏政策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美国对苏联政策研究的不足,而且,也可以使美国的对苏政策更加完整,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美国的对苏政策。

其次,研究这段历史既可以增强我们对历史学、政治学等理论的理解,同时,这一时期美国对苏联政策所表现出的错综复杂的内容和特点也为历史学、政治学等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美国对苏联的认识水平和外交实践,还可以借此进一步检验和丰富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某些理论和观点。

本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目前看,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已经从对抗走向合作,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

^①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时期也属于美苏冷战时期。如罗纳德·E. 波亚斯基(Ronald E. Powaski)认为,冷战是从1917年开始的,参见Ronald E. Powaski,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本杰明·D. 罗德斯(Benjamin D. Rhodes)认为,冷战是从1919年夏以后开始的,参见Benjamin D. Rhodes, *The Anglo-American Winter War with Russia, 1918—1919: A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Traged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② Mary E. Glantz, *FDR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President's Battles over Foreign Polic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p. 4.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矛盾和冲突不断。因此,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实现民族的复兴,借鉴历史上美国对苏联的外交实践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由于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仍然坚持意识形态的考虑,所以,了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的出发点、过程和影响决策的因素对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中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一) 国外学者对“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的研究状况

一直以来,由于美国对苏政策对整个国际格局演变的重大影响,所以,国外学者包括一些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军事学家等非常重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的研究。从他们研究的内容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专题性的研究,一类是总体政策的研究。

1. 专题性的研究

许多国外学者试图从国际关系的层面对美国对苏政策进行分析和说明。小约瑟夫·S. 奈(Joseph S. Nye, Jr.)编写的《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制定》(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①收录了美国研究此问题的13位学者的文章。有代表性的如乔治·里斯卡(George Liska)在《重新思考美苏关系》(Rethinking US – Soviet Relations)^②中,从战略和政策结构、空间战略防御、区域冲突的地缘政治等方面阐述了美苏关系。托马斯·B. 拉里森(Thomas B. Larson)在《苏美对立》(Soviet – American Rivalry)^③中,主要探讨了美苏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拉尔夫·K. 怀特(Ralph K. White)在《可怕的挑衅者——从心理方面剖析美苏关系》(Fearful Warriors: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U. S. – Soviet Relations)^④中,从心理学方面分析了美苏外交政策的矛盾复杂心理。怀特认为,之所以说苏美是战争挑衅者是因为,苏美虽然也憎恨和害怕战争,但是它们一直都在大量地生产毁灭性的武器,从

^① Joseph S. Nye, Jr., e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George Liska, *Rethinking U. S. – Soviet Relations*, Oxford: B. Blackwell, 1987.

^③ Thomas B. Larson, *Soviet – American Rival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④ Ralph K. White, *Fearful Warriors: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U. S. – Soviet Relations*,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l, 1984.

而使战争一步步逼近。他认为,如果美苏的军备竞赛趋势不改变、不停止,那么,美苏中的一个国家很可能会成为战争发起者。此外,其他学者也从国内形势、公共舆论、国会等方面对影响美国对苏政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

对苏贸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国外学者在审视美国对苏政策时经常从经贸领域入手。从事这方面研究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詹姆斯·K.利比(James K. Libbey)及其两部著作《美俄经济关系——相关问题的考察》(*American – Russian Economic Relations: a Survey of Issues and Reference*)^①和《美苏经济关系1770s—1990s》(*American – 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1770s—1990s*)^②、约翰·W.波奥(John W. De Pauw)的《苏美贸易协定》(*Soviet – American Trade Negotiations*)^③以及菲利普·J.芬内基奥(Philip J. Funigiello)的《冷战中的美苏贸易》(*American – 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④。利比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时间跨度大,他对从美国派遣的第一个对俄特使丹纳到布什政府时期的美苏经济关系都进行了分析,并对美苏两国的外贸体制和贸易关系的特点进行了说明。利比认为,尽管美苏之间冲突不断,但美苏贸易的前景非常乐观。波奥在《苏美贸易协定》中,主要审视了美国同苏联协商贸易协定的过程。波奥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美苏两国政府官员和商人对贸易协定一直怀有极大的兴趣,但是,两国之间的商业谈判却非常困难,特别是由于美苏政治关系模式的不同,更增加了这种困难。尽管如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求贸易往来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两国之间的商业交往也一直持续不断。特别是1978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和交易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了便于人们了解影响美苏商业谈判的一些因素,作者在简要回顾美苏建交以来美苏贸易关系的基础上,从苏联负责商业谈判的组织、美国从事商业谈判的公司、美苏商业协定谈判中遇到的困难和困难的克服、美苏商业谈判中来自美国方面的政府的和非政府的障碍、美苏商业谈判中来自苏联政府的和非政府的阻碍等方面全面考察了美国与苏联商业谈判的过程,为美国制定对苏联政策提供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芬内基奥的著作则把研究重心集中到一个特定的时期。他通过考察冷战时期

^① James K. Libbey, *American – Russian Economic Relations: a Survey of Issues and References*, Claremont: Regina Books, 1989.

^② James K. Libbey, *American – 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1770s—1990s*, Claremont: Regina Books, 1989.

^③ John W. De Pauw, *Soviet – American Trade Negotiation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9.

^④ Philip J. Funigiello, *American – 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美国对苏联的外贸政策及其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论证了美国政府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的原因和目的,使经济制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手段的历史过程。

文化交流和对苏广播宣传也是美国对苏联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处于进退两难的难以取舍的境地,为了找到两种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的结合点,美苏两个国家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不懈地对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探索和研究,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耶鲁·里士满(Yale Richmond)和J. D. 帕克斯(J. D. Parks)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里士满是负责美国政府对苏文化交流工作的官员,20年的工作经历使他亲身体会到美苏文化交流的艰难,1987年,他根据亲身经历和丰富的资料,出版了《1958—1986年美苏文化交流——谁是赢家》(*U. S. -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①一书。在著作中,里士满从艺术、展览会、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等方面详尽地考察了美国与苏联文化交流的现状及其趋势,为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对苏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帕克斯在《文明、冲突和共存,1917—1958年美苏文化关系》(*Culture,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American - Soviet Cultural Relations, 1917—1958*)^②一书中,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美苏两国特别是由两国政府所倡导的文化关系。著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958年两国官方文化交流协定的签订。在书中,帕克斯使用了大量的资料,如国务院文件、美苏文化方面的各种期刊和一些机构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帕克斯提出,在美苏不断加紧生产大规模核武器,战争威胁日益临近之机,两国间签订文化协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种文化关系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可以减少两国对彼此的无知,从而降低战争的危险。帕克斯在著作中对美苏文化关系的探讨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由于他对和文化关系相关的俄国的社会制度、政策和相应的知识了解太少,对所论述的主题的概括过于简略,因此,帕克斯著作的研究深度不够。除了上述学者外,小尼斯·詹姆高特(Nish Jamgotch, Jr.)的《美苏合作——一个新未来》(*US - Soviet Co-operation: A New Future*)^③、西格·米库森(Sig Mickelson)的《美国的另一个声音——自由欧洲和广播自由的故事》(*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

① Yale Richmond, *U. S. -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② J. D. Parks, *Culture,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American - Soviet Cultural Relations, 1917—1958*, Jefferson: McFarland, 1983.

③ Nish Jamgotch, Jr., *U. S. - Soviet Co-operation: A New Future*, New York: Praeger, 1989.

dio Liberty)、^① K. R. Short 的《越过铁幕的西方广播》(*Western Broadcasting over the Iron Curtain*)、^② 罗伯特·W. 皮尔逊(Robert W. Piersin)的《美国之音,1940—1962 年美国政府的国际广播行动史》(*The Voice of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ctivities of the US Government, 1940—62*)^③ 和卢德米拉·亚历克耶娃(Ludmilla Alexeyeva)的《美国对苏联的广播》(*US Broadcasting to the Soviet Union*)^④ 也从各个角度对美国对苏联的文化政策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在对美国文化政策的考察中,美国学者也注意借鉴苏联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诺曼·索尔(Norman E. Saul)主编的《1776—1914 年俄美关于文化关系的对话》(*Russian – American Dialogue on Cultural Relations, 1776—1914*)^⑤ 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在《1776—1914 年俄美关于文化关系的对话》中,索尔收录了俄罗斯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关于美苏文化关系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主要探讨了五个问题:美苏所做的对对方文化生活的贡献;美苏两国之间的科学家、作家的通信和其他形式的交往;公众理解的进展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进展的改变;美国对 19 世纪俄国期刊的关注;美国历史上俄国人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每一个俄罗斯学者论文的结尾,都跟有美国学者的评论。由于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并提出了新的科学的观点。因此,这部著作为全面考察俄美文化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我们了解美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重视美苏两国公民间的关系,以及探讨美国对苏联的看法也是美国对苏联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代表是盖尔·华纳(Gale Warner)和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华纳和舒曼在《公民外交官——苏美关系的开创者》(*Citizen Diplomats: Pathfinders in Soviet – American Relations*)^⑥ 中,高度评价了美苏一些普通的公民在两国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本森·L. 格雷森(Benson L.

^① Sig Mic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New York: Praeger, 1983.

^② K. R. M. Short, *Western Broadcasting over the Iron Curtain*, London: Croom Helm, 1986.

^③ Robert W. Piersin, *The Voice of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ctivities of the U. S. Government, 1940—62*, New York, Arno Press, 1979.

^④ Ludmilla Alexeyeva, *U. S. Broadcasting to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Helsinki Watch, 1986.

^⑤ Norman E. Saul, *Russian – American Dialogue on Cultural Relations, 1776—1914*,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⑥ Gale Warner and Michael Schuman, *Citizen Diplomats: Pathfinders in Soviet – 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ntinuum, 1987.

Grayso)在《美国眼中的俄国,1917—1977》(*The American Image of Russia, 1917—1977*)^①中,则就美国对俄国的看法做了阶段性的详尽论述。格雷森认为,美国对俄国的印象经常发生变化。在18世纪早期的美俄关系中,美国把俄国看成是一个遥远而潜在的朋友,能对美国的反英事业提供支持。到了19世纪末,美国态度发生转变,它开始与英国重修旧好,却对沙俄政府逐渐厌恶并冷淡下来。1917年3月,美国又与俄国临时政府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而当临时政府被推翻后,美国开始把苏俄政府看成是对民主制度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大部分美国人对苏联充满疑虑和担心。1945年以后,由于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出现,使美国更加关注苏联。格雷森特别提出,从1917年尤其是二战以来,许多世界历史可以用美苏关系史来代替。因此,评价1917—1977年美国对俄国的看法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世界过去的发展,而且也能指导人们预见未来。除了格雷森以外,威廉·韦尔奇(Willian Welch)的《美国眼中的苏联外交政策》(*American Image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②、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 Cohen)的《苏维埃——美国的理解和真实的苏联》(*Sovieticus: American Perceptions and Soviet Realities*)^③也对美国对苏联的一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除了在横向领域考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外,国外学者还从纵向领域对武装干涉、赤色恐怖(The Red Scare)、承认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联盟、冷战等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进行了阶段性地考察。尤其是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更是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从冷战起源方面的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④到冷战后果方面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及其他经济方面的影响,^⑤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

① Benson L. Grayso, *The American Image of Russia, 1917—1977*,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 Co., 1978.

② Willian Welch, *American Image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 Stephen F. Cohen, *Sovieticus: American Perceptions and Soviet Reali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85.

④ 这几种派别的主要代表分别是:Herbert Feis, *From Trust to Terror, 1945—50*, New York: W. W. Norton, 1970.

Carbriel and Joyce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4*,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John L.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⑤ Hugh G. Mosley, *The Arms Rac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5.

James L. Clayton e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70.

Steven Rosen ed., *Testing the Theory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Lexington, D. C.: Heath & Co., 1973.

海,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2. 总体政策的研究

对美国的苏联政策进行总体研究的著作也很多。

二战以后,国际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演变,社会主义冲破了一国的范围,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局面。面对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势头,很多美国人对苏联的下一步行动产生了担心和疑问:苏联还准备继续扩张吗?它打算走多远?苏联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吗?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能否不发生冲突而实现和平共处?如果发生冲突,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如果能避免冲突,苏联和美国能达成妥协吗?如何达成妥协?美国能信任苏联吗?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美国外交事务权威维拉·米切尔斯·迪安(Vera Micheles Dean)在1947年出版了《美国和俄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①一书做出回答。迪安指出,对苏联,美国既不能盲目地赞扬,也不能不加区别地全面攻击,更不能为了迎合公众的情绪随意曲解一些有争议的事件,对这些事件提供错误的事实,以及做出错误的评价都是十分危险的。迪安认为,美国应当首先对苏联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找到和苏联和平相处的办法。为了使美国人的思想和实践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迪安着重分析了二战以后苏联的自然概况、政治经济制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思路和美苏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他指出,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双方缺乏了解并容易形成偏见,由于这些偏见所造成的误解,美苏两国谁都不愿意放弃传统的道路和政策并向对方妥协。迪安批评了美苏的上述做法,他建议,美苏两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对世界发展前途的重要性,应当从现实出发,相互做出让步。因为战后世界的重建和战后世界秩序的稳定依赖于美苏是否能够消除国家政策上的分歧,依赖于美苏是否能够在控制核能源、削减军备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进行有效合作。迪安认为,唯有如此,美苏才能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人们的生活自由提供保证。由于迪安的著作注重的是解决现实问题,所以,对二战后美苏关系的分析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而1947年以前的美苏关系在全书中只占24页。

被出版商称为“追溯美苏关系源头第一个历史学家”^②的是20世纪美国最著

^① Vera Micheles De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② O. T. Barck, Jr., “American Russian Relations, 1781—1947, by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Rinehart & Co. Inc., 1952”,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 59, No. 1, October 1953, p. 83.